

建构与诠释:情报学研究的科学哲学问题

——评《IRM-KM 范式与情报学发展研究》一书

A Bookreview on IRM-KM Paradigm and Advance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凡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南京, 210093)

在图书情报的学科发展问题上, 历来存在争论与危机: 情报学迷失、情报学危机、情报学技术异化、“大小情报学观”之争, 情报学理论的空心化和边缘崛起的“分裂的无结构控制的灵活体”论断……同时, 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泛化、商业竞争的泛滥, 使得国外学者 Pertti Vakkari 认为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必要资质正在逐渐丢失, 而情报学的学科地位以及社会认同也随之开始动摇^[1]。总之, 情报学研究面临一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学科危机”, 对此研究也十分活跃——据刘旭旭^[2]、马德辉^[3]等学者不完全统计, 我国图书情报学界每年约有 15%~20% 左右的文献探讨情报学学科建设、情报学理论体系、情报学思想体系、情报观等。

因此, 探索学科发展模式 and 路径不仅需要足够的担当和勇气, 也需要足够学术阅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IRM 及 KM 范式下的情报学发展模式研究”(项目编号: 03BTQ012) 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扬帆起航的, 因此学术团队的担当精神与责任感让人肃然起敬。而作为本项目最终成果的专著《IRM-KM 范式与情报学发展研究》一书(后称《范式》一书)不仅以科学、规范而优美的学术语言研究了情报学学术共同体、结构范式、研究群体、学术流派和基本定律, 提供了学术研究的典范; 而且对“情报学危机”提出了深刻的学术见解, 也折射出基于科学知识建构主义和科学诠释的科学哲学理念。

1 《范式》对情报学学科困境的科学认识

谈及情报学学科困境, 想起一则科学典故: 莱辛巴赫(Reichenbach)与维特根斯坦对“ $2+2$ ”为什么等于“4”的证明^[4]。莱辛巴赫认为“被定义的数字与在定义中使用存在算子的数目之间的对应”作为一种存

在, 逐渐消除了其它数字符号与算子的对应可能, 形成了“逻辑定义($2+2+2+4$)”与“存在”(真实内涵)之间由“示例——一般化——公理”的逻辑过程。维特根斯坦的论证要简洁得多, 他认为“ $2+2=4$ ”本身是一种社会约定, 可以接受, 也可以放弃, 如果参与社会约定的群体足够大时, 这种“集体式的认同”形成了科学知识的逻辑。莱辛巴赫的符号存在主义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社会学(或语言游戏)讨论的是名与实的问题, 在情报学的学科困境中主要也是围绕名与实的论争。

1.1 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的学术性社会契约

诚如符号存在主义学者所担心的, 情报学的名称与情报学的研究活动、情报学学者的研究内容的实并不完全一致, 名不副实, 最终导致情报学向信息管理的更名。然而, 更名引发了两个矛盾: 一是把与情报学并不完全对等的信息管理的“实”与情报学的“名”对应起来的泛化矛盾; 一是把情报学的“实”与信息管理的“名”对应起来的认同矛盾。因此, 有学者试图用一种产生于信息、又负载有情报特质的“智能情报学”(infotelligence science)的新概念。《范式》一书在论及“情报学发展困境”时, 客观分析了情报学技术扩张带来的危机和挑战, 认为情报学是信息管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源一流一用”的核心思想, 信息管理学与情报学具有天然的关联与延续; 但信息管理学的产生是不成熟的“学术妥协”, 虽然信息管理科学并不能完全代表情报活动的实际内涵, 但却没有更好的“名”比信息管理学更能涵盖传统情报学在新技术环境下所不能代表的“实”, 最终形成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并存发展、相互促进的格局。这一格局好比在学术范畴内诞生的互相妥协的约定——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的学术性社会契约。

1.2 情报学的科学知识建构主义

国内很多学者担心这种泛化是否失去了控制,过于宽泛而失去了控制,使“情报学的发展偏离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其根本问题则是信息管理学是否带来情报学泛化而改变了原有学科的宗旨——从建构主义角度解读,即信息管理学是情报学的“图式扩充”,还是“图式变异”的问题。图式是皮亚杰(J. Piaget)提出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时描述认知结构的观念,而图式发展总是面临图式扩充(认知结构数量的扩充)和图式变异(认知结构性质的改变)两种变化。与之对应,“同化”与“顺应”则是两种过程的解释:同化是指把外部环境中的有关信息吸收进来并结合到已有的认知结构中,即个体把外界刺激所提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认知结构内的过程;顺应是指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而原有认知结构无法同化新环境提供的信息时所引起的认知结构发生重组与改造的过程,即个体的认知结构因外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过程。认知个体就是通过同化与顺应这两种形式来达到与周围环境的平衡,并在“平衡—不平衡—新平衡”的循环中得到不断的丰富、提高和发展。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以社会建构主义和知识建构主义为基础,把科学的发展与变化解释成社会状况与利益的变化,认为科学知识本质上也是社会建构或存在决定的^[6],社会、技术环境变革与学科知识间“同化”和“顺应”的建构过程——情报学的发展也应是社会建构的,是一直开放发展的知识体系。

同时,在科学知识的演进过程中,建构主义还存在一类以不可表达、不确定性、多元性、去中心化、解构与重构、对现有知识体系的怀疑等主张和特色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理解:在继承建构主义对科学知识还原论、确定论与唯一论否定的基础上,走向了虚无、自由、不予言表的另一极端。体现在情报学发展中,失去学科发展内核,学科边界模糊,社会认同差等现象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对于情报学的后现代理解,《范式》一书在第176页明确提出“对于后现代科学这种提法,我们持保留意见”,并且主张在情报学的理解上回归情报学的功能和目标,而且对情报学“元理论”的研究上给予了一定的理解和支持,并提出了若干基

础理论^[6-7]。

因此,《范式》一书在情报学发展的科学哲学问题上,以科学知识的开放发展为基点,认可情报学知识的无序或曲解存在的合理性,但反对过于自由、不加凝练和浓缩的学科发展模式,以库恩的范式理论为依托,运用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的立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先后对IRM活动、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知识管理理论和情报学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学术历史研究的解构梳理,从学术史料组织中描述和分析了情报学知识演进过程。其研究方式和结论不仅展示了情报学理论清晰的理论脉络和图景,揭示了情报学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从根本上揭示了情报学理论“图式扩充”和“图式变异”有机融合的事实,很好地回应了那些或割裂融合事实而强化情报学学科本位的担忧,或不予限制的后现代扩张的“迷失”。一言以蔽之,《范式》一书基于科学的知识建构主义的立场,以开放、科学的学术态度和视角,对情报学发展的审视高屋建瓴。

1.3 情报学的社会认同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缺少社会认同的知识什么都不是,仅仅是没有意义的逻辑符号。引文分析中广泛关注到的情报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不对称引用、公共知识空间中情报学的贫乏以及由此导致的公众关注度低和就业市场的竞争压力,衍生学科内外对情报学的社会认同的广泛担忧。《范式》一书没有回避情报学发展所处的尴尬境地,而是从“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双重语境,“日益复杂的学科情景”,研究对象和载体的变化以及学术机构和环境的变化出发,论述“情报学需要做出并如何应对”,不仅对情报学发展趋势提供了指向性的观点,而且提倡情报学的“顺应”建构的科学性和必要性,不能否定现在转向信息资源管理和知识管理(IRM&KM)范式的情报学学科属性。

2 《范式》的情报学研究方法典范

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体现在研究方法的合理和适用。情报学发展作为认知性极强的学术主题,以往多采用归纳、演绎或列举等研究方法,这类研究成果的取得往往与研究者的自身的领悟和观察的敏锐程度相关。而《范式》一书采用共被引分析法和共词分析

法等定量研究法,直观和可视化的方式来展现研究过程,既实践了科学实证的研究理念,又增强了理论的厚实感和信度,为当下情报学领域研究的方法典范。

2.1 实证主义和诠释学相融合的研究方法取向

艾尔·巴比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就是“理解—假设—验证”为代表的实证模式。汪冰博士曾经系统考察过实证主义、现象学和诠释学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应用^[8],认为实证主义认识论是“仍在控制着大多数严肃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者的思维方式与工作的哲学认识论”,并援引 Herbert Giddens 以及 Charles H. Busha 和 Stephen P. Harter 的言论进行了论证;而 I. A. Hoel 和 R. Capurro 等讨论了图书情报学的现象学和诠释学视角。荷兰著名情报学家 Hjørland 也指出^[9],实证主义思想一直体现于情报计量和情报检索评价研究。近年,赖茂生、王琳等学者也指出^[10],实证主义是情报学主流学术传统的哲学基础,但面临从实证主义为主导到多元的哲学思想互为补充的趋势。通过廖利伟等的统计,目前在情报学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中,实证比例正在逐年提高;叶继元等学者则呼吁图书情报研究需要向实证研究转向。John M. Budd 和 T. D. Wilson 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向人文学科扩展,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现象诠释(Hermeneutical Phenomenology)也成为图书情报学的认识论基础^[11-12]。台湾学者王美鸿也认为^[13],现代阐释学推动了图书情报学的重大变革,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继理性主义、认知观、意义建构之后,开始成为图书情报学领域重要的研究取向。

《范式》一书基于历史演进的诠释和数据定量分析的实证,不仅体现了实证与诠释融合的方法取向;而且极好地契合了本书的研究主题。尤其是在信息资源管理(IRM)和知识管理(KM)的范式的分析和确定中,采用了不同侧重的方法:对于 IRM,侧重以“问题史”研究为切入点,选取《美国情报科学(技术)学会杂志》(JASIS(T))、《情报科学与技术年度评论》(ARIST)以及 CoLIS 大会(Concep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图书情报学的理论与前景”国际研讨会作为考察样本,从起源、发展沿革、学派、研究图景的历史分析来发掘范式或共同体的形成和内涵,通过基

本范例、技术工具、共同信念和价值实现这四个要素对 IRM 共同体的特征进行讨论;对 KM 范式则采用共词分析的可视化的实证研究来探讨和鉴别其学科范式,即通过知识管理领域关键词的共同出现情况,利用 Winisis 软件分析了 861 篇英文相关文献和 1782 篇中文相关文献的 9 个检索指标来寻找和发现知识管理范式及其特点。

2.2 国内情报学学科研究方法的突破

以“情报学”为标题精确检索入口,《情报学报》和《中国图书馆学报》1979~2010 年发表学术性文献 137 篇,以 5 年为一个考核周期,发现该领域实证研究文献呈逐年增加之势,但实证采纳总体不足两成(如表 1 所示)。同时,笔者以 CNKI 被引率较高和作者影响较大(较新文献的选择依据)为标准选取了 29 篇文献采用内容分析法(剔除了与本课题相关的 4 篇文献),仅有 2 篇运用了文献计量的实证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的贫乏,与我国图书情报学的整体学术环境以及“情报学学科发展”这一特有主题不无关系。因此,《范式》一书采纳实证分析用于情报学学科发展研究,方法论具有先进性和超越性。与运用计量方法的 2 篇文献相比,《范式》一书在方法论上还有两个超越:第一,《范式》一书以关键词、标题词等文献内容特征作为实证分析素材,超越了同类研究中以引文、篇目数量等计量属性;第二,《范式》一书对知识单元的原子团簇结构和伞形结构等关系网络结构进行了深入分析,超越了传统文献量统计对量纲和统计强度关注,在情报学实证研究领域处于领先。

表 1 我国图书情报学关于“情报学”的重要文献的研究方法分布

研究方法类型	1995 年以前	1996~2000 年	2001~2005 年	2006~2009 年
实证研究	5	3	6	13
非实证研究	22	37	33	18
总计	27	40	39	31

因此,《范式》一书的研究方法不仅体现了当代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主流哲学思潮和方法论取向,而且在国内同类型研究中出类拔萃,属于领先水平。

3 《范式》对情报学理论的主题拓展与回归

《范式》一书不仅是对情报学科发展困境的检讨

和分析,且对其定位、方法、未来发展均提炼到“知识范式”,是新情报学理论构建和发展的重要借鉴。

3.1 情报学基本目标和任务的回归

《范式》一书意识到情报学的外延过于泛化“不利于”情报学当前的发展,认为无论情报学发展模式如何演变,研究对象如何从文献、信息和知识间跃迁,情报学都是围绕:“源—流—用”的研究范式展开。因此,被迫推向前台的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之间的并不能完全兼容,情报学只能承担信息管理的部分职能;同时建立在科学情报基础之上的情报学六个基本定律,即离散分布定律、相关性原理、有序性原理、易用性原理、小世界原理和对数透视原理,为情报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也提供了依据。基于此,《范式》进一步提出情报学的基本目标和任务是将知识和信息组织有序化,以用户认为方便的形式提供有效利用。在这一目标任务框架下,引进现代化的信息技术的知识信息加工处理方法远远不够,还必须研究知识信息分布的规律,找出它们自身及其与用户的关联,帮助用户以最省力和最有效的方式获取最有价值的情报。

《范式》对情报学基本目标和任务的回归,使人们看到了情报学协调发展的曙光:不至于泛化无核而缺乏认同,也不至于弱化无物而趋于消亡。

3.2 情报学新的研究范式和主题拓展

《范式》也意识到情报学与信息技术的相关性与生俱来,技术因素也往往在情报学发展史的回顾充当着主要线索的角色。因此,信息技术和情报学研究对象的跃迁不可避免地引入新的研究范畴:IRM 和 KM。作为本书的主要论述观点,主要是从 IRM 和 KM 的角度研究情报学与 IRM 和 KM 之间的关系,以库恩的范式和科学共同体理论为基础,考察了 IRM 共同体的形成,分析了国内外 KM 研究结构及其范式;结合 IRM、KM 对情报学发展的影响,提出了情报空间模型,讨论了情报空间中的基本原理,并以实证方式研究了 IRM、KM 范式下的情报学研究群体、学术流派和基本定律。

IRM 和 KM 研究范式有机融合了情报学的研究手段和方式,为情报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同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拓展了情报学在社会实践中的

应用空间,在理论研究中也为“新”情报学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平台。正如《范式》前言所说,“信息资源管理(IRM,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和知识管理(KM, Knowledge Management)的提出,使得情报学面临着一个重新审视学科发展的机遇和选择。”

笔者认为《范式》一书不仅揭示了情报学学科的发展是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也展示了国内情报学研究实证和诠释的科学哲学取向,是关于情报学研究的研究,深刻而高远。

参考文献

- 1 Vakkari P. Opening 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In Vakkari P, Cronin B(Ed). *Concep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Historical,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London: Taylor Graham, 1992: 1-4.
- 2 刘旭旭. 我国情报学研究的发展状况.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5(6)
- 3 马德辉. 1991~2000 年我国情报学理论研究论文统计分析. *图书情报工作*, 2002(3)
- 4 [英]巴里·巴恩斯, 大卫·布鲁尔, 约翰·亨利主编, 邢冬梅, 蔡仲译. *科学知识: 一种社会学的分析*.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33-257.
- 5 [英]巴里·巴恩斯著, 鲁旭东译. *科学与社会学理论*.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7
- 6 马费成. 论情报学的基本原理. *资讯传播与图书馆学*, 2002(3)
- 7 马费成. 论情报学的基本原理及理论体系结构. *情报学报*, 2007(1)
- 8 汪冰. 试析情报科学研究的若干重点与发展方向. *情报科学*, 1998(4)
- 9 Hjørland B. Empiricism, rationalism and positivism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05(1)
- 10 王琳. 数字化时代的情报学理论进展. *图书情报工作*, 2009(2)
- 11 John M. Budd. An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Quarterly*, 1995(3): 295-318
- 12 Wilson T 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research relevance: Issues for inform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03(6): 445-452
- 13 王美鸿. 图书资讯研究的另一取向: 诠释学. *图书馆学与资讯科学*, 2000(1)

(收稿日期: 2010-04-10)